

建人民大会堂时主要考虑垮不垮

“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份。”这是北京市原副市长张百发对1959年的评价。

那一年,只有18岁的他作为参与人民大会堂建设的施工代表走上领奖台,为他的“青年突击队”领了一个国家级的“先进集体奖”。

在那之前一年的夏天,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,要大规模庆祝国庆十周年,建设一批国庆工程,目的是“检验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”。

事实令人振奋。从1958年开工到竣工,仅仅10个月间,北京冒出了10座标志性建筑,人民大会堂居首。这十大建筑,总建筑面积达到了64万平方米,到今天仍是北京的重要地标。

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

当时中央的精神,要求这“十大建筑”能够反映和代表全国工、农、兵、侨、民族、文化、科技等各个领域的成就。

“‘工’是工人体育场,‘农’是农业展览馆,‘兵’是军事博物馆,‘华侨’就是华侨宾馆,‘民族’是民族文化宫,‘文化’是美术馆,‘科技’是科技馆,人民大会堂当然就是代表所有人民群众了。”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的设计师董光器告诉记者。

前些年才落成在天安门左近的国家大剧院,当年也曾被列入“国庆十大工程”,后来因为时间实在不够,才暂时搁置。

十大工程里,人民大会堂是重头戏,所以天安门广场的



1959年大会堂站了起来

改造也就迫在眉睫。

董光器回忆,广场如何改建的问题,一直没有定案。后来还是毛泽东亲自指示:天安门广场要从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处一直向南拓展,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。

按照这一指示进行的天安门广场改建,东西宽500米,南北长860米,最终实现的面积达到44公顷。

另一个原则也被确定下来,广场两侧分别建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。

一天,一位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走进了会议室。这位军官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出了三点要求:一、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;二、路面要经得起60吨重坦克的行驶;三、道路及广场要求“一块板”,以便于游行集会。

于是中央决定,西单、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要拆掉,

经过天安门的有轨电车轨道要拆掉,长安街不再设架空线路,线路改走地下。

许多年以后,董光器才了解到,这些要求的提出还有一重考虑——为了战备需要,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。

你的方案考第一,加油干

人民大会堂对于很多人来说,都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契机。比如陶宗震。

当时只有30岁的他任职于北京市规划局,那一年,他临时被抽调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。规划局是审核管理机构,按照规定他不能参加人民大会堂设计稿。

最初总图设定,广场两侧的建筑是人民大会堂、革命博物馆、国家大剧院和历史博物馆四座。有一天,北京市领导到规划局,听取有关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的汇报,陶宗震

提出了一个纪念碑两侧各三幢建筑的设想,话还没说完,领导就插了一句:“国家大剧院不能对着大会堂,要拿出广场。”

不久,他就接到指示,国家大剧院要迁至人民大会堂西侧,广场东侧,将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“合二为一”,西侧的人民大会堂、宴会厅和人大常委办公楼“三合为一”。

他告诉陶宗震,这样安排旨在“突出政治”。

而这时,征稿收到的100多件方案,经过七轮评选,仍旧没有一个脱颖而出。

主抓国庆工程的周恩来,在1958年国庆前下达了指示:要进一步解放思想,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工程各大项目的方案设计。

陶宗震就是此时介入大会堂设计的,动员他做方案的领导说:“这个工程就是考验建筑师会不会花钱,敢不敢花钱。”陶宗震真的放开了手脚。熬了一夜,人民大会堂最初的设计方案出炉了。

第二天一上班,局长告诉他:你的方案考第一,加油干!

那是一个不彰显个人的年代。后来,国家对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颁予荣誉时,所设的都是“先进集体奖”。而陶宗震,只是把自己留存的一份已经褪色的人民大会堂手绘规划图,镶在镜框里,摆在书架上。

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

就在设计师们争议大会堂方案的时候,钢筋工张百发,已经带着他的青年突击队进驻施工现场了。

张百发和他的兄弟们,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,“都有朴素的感情”。那时,他们还不不懂什么叫“人大”。张百发只记得当时公司总经理站在高台子上说:“我们要去建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,就等于修皇宫。参加这个工程你们将终生难忘,一辈子光荣!”

大卡车来了,大家都把自己的行李往上扔,生怕落下。

1958年7月,大会堂开始挖地基了。紧接着,成千上万的工人,从全国各地调到了这里。张百发记得,其中有很多特殊工种都来自外省市,比如铺花岗岩的都是福建工人,做高级木工雕饰的都是湖南工人……

在这个举全国之力的大工程里,有一些镜头让张百发记忆犹新:

工程需要五米六的钢材,张百发他们就给鞍钢打电话,鞍钢轧钢直接就轧了五米六。他们当时开玩笑说,这些钢材运到大会堂的时候,还热乎乎着呢。

还有一次工地需要樟木,其实只需要几十立方米,结果从贵州运来时富余出好多——当地老百姓听说要给人大会堂用,都把自己家最好的樟木往运输车里扔,一分钱也不要。

张百发的青年突击队,从12个人扩充到200多个人,在工地上的十个月,没有休息过一天。他们三班生产,“歇人不歇马”,睡觉从来都不脱衣服。

经过十个月奋战,在内装修开始的时候,青年突击队撤了出去。

再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,是在1959年9月,那时人民大

会堂已经全面建成,周恩来请参与建设的各界代表吃饭,还看了一场梅兰芳的演出。

张百发记得,那天去大会堂,上面规定不许穿钉子鞋,他到了宴会大厅,觉得非常震撼,“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”。

垮不垮是主要的

关于大会堂的争论也一直存在。1959年1月20日,周恩来和彭真召集在京的建筑、结构专家和艺术家座谈。

周恩来说,听说大家对人民大会堂还有很多意见,这个房子如果有缺点,大家就当有病的孩子来对待,首先考虑治病的问题,“人民大会堂这么个房子有两个关键,一个是垮得了垮不了,一个是好看不好看。垮不垮是主要的,大会堂的寿命起码要比故宫长,不能少于350年。”

仅用10个月,十大建筑在首都次第落成。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,称赞它们是“大跃进的产儿”。

许多年后,住在右安门附近或者和平里的北京老百姓,可能仍然会记得,1958年以前,他们的家曾经在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那个位置。

那一年,仅用一个月时间,天安门广场就拆了50多万平方米的房子,10129户居民被安置到右安门附近的一些简易房里。一直到80年代中后期,这些人的居住状况才逐步改善。

周恩来在去世之前曾说,十大工程欠了北京老百姓的债。据《瞭望东方周刊》

“做人要知恩图报,除非死了……”

贫困家庭先后出了4个大学生,一直得到好心人的帮助……

他和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妻子靠捡垃圾和卖菜供出4个大学生,10年来,对那些曾帮助过他们的好心人,夫妻俩都牢记在心,并尽自己所能予以报答——哪怕是一棵白菜或是帮忙下力。

“做人要知恩图报,除非死了……”如今,生命处于倒计时的他,用这样的“家训”教育子女。

患重病不忘报恩

63岁的杨明达一脸病容,25日,当他拖着一个烂麻袋从街上回来后,就一下子瘫倒在床上。麻袋里,十多个捡来的矿泉水瓶子散落一地。

这里是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春花4组,空荡而破旧的村落里,只住着老杨一家人——因修建工业园区,6月初,这里所有住户必须全部迁出。其他人都迁走了,老杨和妻子没地方去——这破旧的房子都不是他们的,好心人让他们免费住了10年。

“老杨,我婆婆又不好,你……”房东的儿媳杨天蓉冲进屋,想请会针灸的他去给婆婆治疗,但看到老杨憔悴地躺在床上,她马上打住话。

老杨从床上坐起,二话不说,就朝房东黄明书一公里外的新家走去。

从黄家回来,天已擦黑。“还是老毛回,给她扎几针就好了。他们给钱,我没收。”老杨又躺在床上,对妻子说

“唉,他们对我家有大恩,住了10年都不收房租,怎么能收钱。只怕我活不了几天,那么多好心人,我报答不完……”老杨闭着眼睛说。

今年春节,老杨被查出患心肌梗死,医生建议做手术安心脏支架,要8万元左右,他藏起病危通知书溜出医院。

沉默中,老两口吃着用白菜和着米煮的、没有一点油水的烫饭,眼泪一滴滴落在碗中。

这样的饭,他们已吃了整整两个月。

供出4个大学生

老杨本是垫江县杠家乡人,10年前,家里房子垮了,他们没钱修房子,只好举家迁往春花4组,这里有很多闲置的土地。种菜卖钱养大4个孩子,是老杨背井离乡的初衷。

“当时本来说好,房租每年100元,可黄家见我们可怜,不肯收了。”老杨说,黄家是在异乡遇到的第一个恩人。

老杨从4户村民手里租了十来亩土地种蔬菜,租金就是帮这4家人缴公粮。

卖菜一年纯收入不到2000元,为了4个孩子,夫妻俩不得不一边种庄稼一边捡垃圾供他们读书。无数次,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妻子任淑兰晕倒在垃圾堆边,每次捡回一条命醒来后,又不得不拖着麻袋继续在垃圾堆里刨啊刨。

即便怎么刨,孩子们依然吃不饱。一对双胞胎女儿在学校住读,每顿饭她们都只打一份饭菜,合着吃;上高中的儿子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。

4个孩子成绩很好,他们常常有放弃读书外出打工的念头,老杨不许:“我自己就是没文化,才让孩子吃这么多苦。”

2004年,大儿子杨天伟考上广东茂名理工学院;2005年,



二儿子杨天罡又考上华南农业大学,目前正攻读硕士;2007年,一对双胞胎女儿分别考入西南大学和重庆工商大学。

放假了,孩子们一般都不回家,这样可节约路费,也可在大城市里打工、捡破烂挣生活费。孩子们有出息,又懂事,老杨很高兴,可面对每年共计近4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,他们只能拼命捡垃圾。

一定要回报好心人

老杨每月44元的低保,是这个家继续捡垃圾后的又一笔丰厚收入。2007年,老杨一家6口全部享受了农村低保,每月有近200元收入。他永远记得当时的杠家乡乡长周林对他家的照顾。

“当时很多人说我们人户分离10年了,解决低保有问题,是周乡长到处为我们说好话。我二儿子杨天罡考上大学后,他还送了钱……我常常在想该怎么报答他,可我送他什么,他都不肯收。”老杨说。

2008年,老杨家的低保被全部取消,“周乡长调离杠家乡了。”老杨说,直到今年,在新任杠家乡乡长的帮助下,才又给他家解决了一份低保。

为感谢谭乡长,老杨狠心买了包13元的烟送去,谭乡长收下了,可又倒给他200元钱,“他说不能白拿我的烟……”

昨天,得知老杨的情况后,垫江县民政局领导来到他家,送了3000元临时救助金,桂溪镇政府也送来1000元救助金,并表示继续关注其生活状况。“党的恩情,我们全家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”老杨感动得哭了。

老杨和妻子心里还有笔细账——这些年,哪些人帮过他们,怎么帮的。他还让儿子将这些都记在本子上:“以后有能力了,要重重回报。”

老杨印象中,春花4组40多户村民,每一户都对他有恩——有一年开学前,几个孩子1000多元的学费没着落,虽然农村有过年期间不能借钱的习俗,但村里的易华、易成两兄弟还是借给他800元;老支书黄武尧借了400元,这是老杨第4次找他借钱;前不久,黄武尧又拿来两件半新的大衣,老杨很高兴,这下儿子冬天上课就不冷了;才到新家时,邻居程世权帮他插过秧苗……

在村民印象中,老杨总是借钱,多则上千元,少则20元,但他总会尽量还清,还了再借,



▲只要活着一天,老杨和妻子就得去捡垃圾
▲夫妻俩每顿吃的都是白菜烫饭

借了再还。“他从不拖账。”现任村支书龚元明说。

10年来,对那些好心人的帮助,老杨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回报:送菜、帮忙下力不收钱。

10年来,春花4组共去世10多位老人,每次葬礼上,大家都能看到老杨的身影——放鞭炮、抬花圈、守夜、送菜……

5年前,房东黄明书的丈夫江朝安去世后,老杨为之守了10夜。而在此之前,他已义务为江朝安针灸抓药长达半年。

老杨很感激垫江报社一名记者,2005年,正值二儿子杨天罡考上华南农业大学,这名姓吴的记者报道了老杨的故事,并为他儿子的学费四处奔波。“最后,垫江八四厂捐了2000元、县民政局支持了1000元,垫江鼎发公司一位工人捐了400元,民政局李局长和县关工委联系解决了1000元儿子上大学的路费;杠家乡政府出面找县妇联,解决了2000元……”

“那年收谷子后,他给我送了10斤新米,这就是他最好的东西了。”吴记者回忆,“不久,他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生日,非要送我100元钱,我怎么

忍心收他的钱?后来,我才知道,他竟然将家里不多的粮食卖了,才凑了这100元。”

报恩就是杨氏家训

“这些回报不是负担。”老杨说,有些事情是该做的,有些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的。

工业园区征地时,房东曾说“我卖个偏房给你,你再扩建一下,拆迁补偿时也能得点补偿。”老杨拒绝了:“不能这样骗政府的钱,这是搞假。”

地里好点的菜,老杨和妻子舍不得吃,要卖了供孩子读书,他们只吃些别人给的老菜叶。

“我们虽然穷,但要有自己的头脑,要知恩图报。”老杨常常这样教育4个孩子。

“我们父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父母。”大儿子杨天伟说,小时候,父母常把四兄妹拉到院坝里,坐在一条长板凳上,对着天空讲家训:“你们要记得,人要有良心,要记住别人的好!”

“寝室的哥们对我最好,有啥好吃、好玩的,都会无偿与我分享。我无力回报,只能帮他们打水、打饭。”老二杨天罡说,这样做了自己心里好受些。

大儿子杨天伟大学毕业后在广东一企业上班,刚让家里松了口气,不想半年后该企业就垮了,他只得回到重庆,一直没找到固定工作,只能勉强养活自己。作为老大,没能帮父母撑起这个家,他心中很内疚。

老杨不敢将自己的病情告诉儿女,担心影响他们学习:“每一天,都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。”但老杨顾不上想这些,他只想在有生之日给妻子和儿女创造一个家,将6万多元的欠债还清,尽力回报所有帮助过他们的好人。据《重庆晚报》